

威胁认知、领土争端与战略转型：

日本国家战略视野下的俄罗斯

王广涛

内容提要：自近代以来，受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日俄关系经历多次变化，但威胁认知和领土争端问题一直贯穿着两国关系的始终。日俄之间领土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其中，既有日俄两国彼此的威胁认知因素，也夹杂着浓厚的意识形态以及特殊的时代背景因素。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有意淡化俄罗斯作为“威胁”的一面，从战略上重视俄罗斯作为潜在伙伴的可能性。日本此举不仅仅是为解决日俄争议领土（日称“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释放善意，同时还有联合俄罗斯制约中国的企图。在领土民族主义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日本“联俄制华”的政策思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则需要对日本对俄战略的转型以及东北亚地缘格局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持关注。

关键词：日俄关系 领土争端 威胁认知 战略转型

自近代以来，日俄关系受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而几经变化。在此过程中，威胁认知和领土问题贯穿两国关系的始终。思考日俄关系，既要回顾历史，也要关注当下。领土问题是横亘在日俄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但领土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解决两国间的领土问题，同时从战略认知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对俄政策又存在超越领土问题的一面。本文将以日本对俄威胁认知以及两国间的领土问题为线索，在回顾日俄关系史的

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础上阐述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俄战略的发展和演变。

学术界对日俄关系的研究呈两种截然不同的分野。第一类研究强调宏大的历史叙事,从大历史、大战略的宏观视角考察两国关系。¹第二类研究则关注特定的政治议题,主要涉及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围绕日俄战争等历史问题的再讨论。²作为日俄关系中的他者,中文学术界对两国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虽然不多,但随着领土问题的升温以及中国积极塑造周边安全环境的客观需求的增加,也出现了不少针对特定议题领域的研究。³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本文对研究的主题和涉及的概念做以下说明。第一,威胁认知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经常使用的概念,学界对其定义和理解不尽相同。本文采用曾向红和罗金的界定,即“威胁认知是对于威胁、危险所产生的一种直接的感知或者反应”。⁴当然,在威胁认知中涉及国家边界安全方面的威胁认知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日本对俄(苏)的威胁认知中还有来自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威胁认知。第二,关于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本文在分析上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虽然领土问题贯穿日俄关系的始终,但是日俄两国官方对领土问题持不同的立场。第三,本文侧重从日本的视角来分析其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对领土问题的主张以及在二者影响下对俄战略的变迁。考虑到两国关系的互动性,文中也会讨论俄罗斯对日本的认知以及应对。

一、“莫斯科未亚”的“威胁”

帝国的扩张导致俄罗斯和日本两国成为邻国,俄罗斯在其东扩的过程中(对日本而言则是俄罗斯的“南下”)遭遇向北方“开拓”的日本。

1 Mikhailova Yulia and Steele M. William, eds., *Japan and Russia: Three Centuries of Mutual Images*, Global Oriental, 2008; 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伸夫など編『日ロ関係史: 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 猪口孝監修『日本とロシア: 真逆か、相違か?』原書房、2015年; [日]和田春樹:《日俄战争: 起源和开战》上下卷, 易爱华、张剑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版。

2 对于日本而言, 领土问题显然是日俄关系的重中之重, 学术界的研究也较多, 俄罗斯学界对此则相对冷淡。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中文学术界, 笔者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后发现, 涉及日俄关系尤其是领土争端问题的论文, 日本研究出身的作者明显多于俄罗斯研究出身的作者。

3 涉及俄日关系的通史性研究可参见李勇慧:《俄日关系》,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周启乾:《近代东亚中的日本及日俄、中日关系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版; 李凡:《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涉及领土问题的代表性研究参见孙承:《安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方法”及其战略考量》,《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 第47—61页; 阎德学、孙超:《日俄接近新常态评估》,《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 第75—87页; 吕耀东:《日俄关于领土问题的利益诉求及两国关系走向》,《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 第4—9页。

4 曾向红、罗金:《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当代亚太》2020年第1期, 第118页。

幕末海权论者林子平在其名著《海国兵谈》中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做出了生动的描述：“近来，欧洲的莫斯科未亚势力无双。侵占了鞑靼的北方之后，最近又征服了西伯利亚，而且把东方的尽头堪察加也掠为属地。堪察加以东没有再能掠取的国土，于是他们又向西瞄准了千岛。”¹ 1771年从堪察加半岛逃走的匈牙利政治犯贝尼奥斯基（Benyovszky），从堪察加半岛驾船强渡日本，驶入各个港口进行勘察，并向长崎商行主事提交一份有关俄罗斯可能对日本有侵略意图的信笺。这封信笺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俄罗斯就此以强势而来的敌人的形象登场”。²

日本俄国史专家和田春树认为，早期日本人的俄罗斯认知具有三张面孔：作为敌人的俄罗斯、作为邻人的俄罗斯和作为榜样的俄罗斯。³ 作为敌人的俄罗斯这一认知给日本带来的冲击最大。作为邻人的俄罗斯则是两国领土扩张之后的自然结果，日本已经开始接受俄罗斯这个西方强国成为邻国的现实。而作为榜样的俄罗斯则在于其扩张和发展给日本带来的示范效应，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治下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给日本提供了学习和参考的样板。

俄罗斯的扩张迫使日本国内开始了关于海防问题的讨论。德川幕府虽然也意识到加强北方防卫的重要性，但无论是力量上还是技术上其都与俄罗斯存在差距。1808年，幕府派出了以间宫林藏为首的探险队伍深度勘察“北方地区”。帝政下的俄罗斯同幕末的日本成为邻国，是帝国扩张的逻辑使然，虽然彼时的日本尚未实现明治维新，但是已经扩展了北方的疆土。在库页岛地区，日俄两国民众杂居的现象比较普遍，两国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这为日后两国围绕领土问题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一度有所降低。对于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强者是欧美诸国，俄罗斯在多大意义上能够算得上列强尚存疑问。1871年，岩仓使节团开始了为期1年零10个月的欧美访问，使节团在英国、美国、德国做了长期的停留，并潜心调研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类制度，但是访问俄罗斯的时间只有16天。当时负责记录使节团行程内容的久米邦武在归国后所整理的100卷《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中，涉及俄罗斯的部分只有5卷。在久米看来，俄罗斯“行专政之制，虽保国安，养兵力，但就富国而言犹如未开化之国”，较之英法等国，日本更恐俄罗斯，实乃“井底之蛙之类的妄想”云云。⁴ 也就是说，俄罗斯虽然贵为帝国，在富国之策上并不及西欧

1 林子平：《海国兵谈》，第9页，转引自[日]唐纳德·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孙建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44页。

2 [日]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上卷），第46页。

3 和田春树『開國——日露国境交渉』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1年、55—76頁。

4 生田美智子「十八—十九世紀の遺産——日本型華夷秩序から西洋型国際秩序へ」、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伸夫など編『日ロ関係史：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16頁。

列强，近代化是工业综合实力的对比，日本如能够与英法列强为伍，俄罗斯则不足为惧。

然而，俄罗斯的强国地位从来都不是靠自由开放的经济以及完善的工业体系，而是靠不间断的领土扩张和老练的地缘政治手腕获得的。随着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扩张步伐的加快，日本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感知更加具有现实性。1891年，俄罗斯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横贯俄罗斯领土东西的铁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先发制人，于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并于次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同俄罗斯缔结《朴茨茅斯和约》。日本确保了在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南部的经济权益。此外，日本还获得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区域。日本染指库页岛，也为其之后同俄罗斯/苏联之间的领土争端埋下伏笔。日本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以明治维新之后快速的工业化为契机，通过渲染来自“莫斯科未亚”的“威胁”实现了强兵的目标，并最终击败了宿敌俄罗斯。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威胁”的消失，随着此后十月革命的成功，日本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又增加了意识形态上的要素。

二、意识形态的越境与领土问题的产生

(一) 意识形态的越境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经过在欧洲的战争与革命洗礼后，终于以掌握政权的形式呈现于国际社会。共产主义给西方列强带来的“威胁”迫使它们结成反共联盟，以期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日本之所以比较积极，其动因不仅仅在于忌惮共产主义在日本国内传播，还在于担心其殖民地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会受到苏维埃革命的影响。

其实，社会主义思潮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在日本传播。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向着行动的领域发展。第二年，日本便爆发了被称为“米骚动”的全国性大暴动。“米骚动”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政府运动，其爆发的扩大化显然是受到了十月革命的鼓舞。另外，“米骚动”起因在于米价不合逻辑地上涨，而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政府为后来的西伯利亚出兵而大量储米所导致的供需不平衡。¹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宣布成立，并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日本共产党以列宁主义为指导，1922年成立时的纲领就将“废除君主专制”作为第一口号，这给日本政府带来极大恐慌。²那时日本刚进入“大正民主”时代，对来自西方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持相对包容的态度，但对以“废除君

1 宫永孝「日本人のみたロシア革命」、『社会志林』第66卷、第1号、2019年、58—60頁。

2 加藤哲郎「戦前日本のマルクス主義国家論(概観)」、『一橋論叢』第97卷、第2号、1987年、186頁。

主专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则不然，日本共产党被认定为非法政党，其劳工组织活动也被政府严密监视。在日本看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异常活跃是苏维埃俄国强大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总的来说，十月革命的爆发让日本国内既存的“大正民主”进程呈加速势头，同时其势头过于迅猛导致日本政府开始警惕各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

对于来自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威胁”，日本政府则以另一种形式的“越境”来对冲这一意识形态的“越境”。日本担心社会主义思潮会渗透其殖民地朝鲜，便以十月革命为契机，开始了出兵西伯利亚的进程。日本同美英等国于1918年8月出兵西伯利亚，日本出兵7万多名，占有所有国家出兵总数的3/4。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出兵，其主要意图在于：首先是以先发制人的态势杜绝十月革命思潮在日本国内以及其殖民地（例如朝鲜）的传播，其次是借机妄图将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区域纳入其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日趋巩固，其他列强相继退出干涉战争，所以唯独日军苦苦留守，并最终于1922年被迫撤军，出兵西伯利亚以失败告终。¹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崛起，对外侵略和扩张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特征。日本与苏联在1925年建立邦交之后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关系，但从战略上如何定位日苏关系仍然困扰着政策制定者。苏联多次向日本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对此日本态度相对消极。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军部看来，“北上”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选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动机之一就是反苏反共，防止中国东北地区“赤化”，并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绥靖主义政策。²在此背景下，日本与德国在1936年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虽然日本强调不以特定国家为目标，但该协定仍然能起到牵制苏联的作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特别是“北上”尝试遭遇挫折之后，日本逐渐放弃“北上”而寻求“南进”。为解决“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与苏联在1941年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暂时稳定了同苏联的关系，以专心同欧美各国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国内对苏联认知出现明显分歧。例如，近卫文麿认为苏联是一个比中美英三国要严重得多的“威胁”，苏联没有放弃将全世界变成共产主义制度的雄心，而且一直图谋干涉日本政治，并引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³为顺利推进日本的大陆政策，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曾被视为日本陆军接下来重点进攻的对象，但是，张鼓峰事件、诺门坎事件让日军遭遇重大挫折，使其放弃了进攻苏联的想法。⁴苏联寄希望于日本“南进”并同英美等国开战，并

1 宫永孝「日本人のみたロシア革命」、58頁。

2 李凡：《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第82页。

3 [美]入江昭：《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吴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07页。

4 [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韦平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认为这是收回库页岛以及相关地区权利的好时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则一度成为日本对外战略中寻求合作的对象，曾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积极争取日苏德意四国同盟就是明证。¹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露出颓势，日本国内有部分人希望苏联扮演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那样的调停者角色。²虽然这一系列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但却表明了苏联在战时日本对外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当然，战争最后阶段苏联戏剧性地撕毁日苏条约、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则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战后的东亚秩序。

(二) 领土问题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进入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期，不久美苏两国的全面冷战也宣告开始。苏联从战时的中立国到战争最后阶段的交战国的角色转换，给日本带来了若干非常棘手的外交课题。其中最难以解决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是领土问题，这是日苏关系以及冷战结束后日俄关系的焦点。

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C项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由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和约》所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阶段，苏联对日宣战后相继占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旧金山和约”中规定日本所放弃的领土实际上为苏联所领有。同时，由于美国主导了战后对日占领的逐项议程，日本在外交上没有独立的政策空间，同苏联之间则处于间接的对立关系。³1956年日苏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领土问题也是最棘手的事项，受到两国国内问题以及美国这个外在因素的压力，日苏最终以搁置领土争议的形式恢复了邦交，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伴随着冷战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⁴日苏之间围绕领土问题的谈判不仅仅是日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对日本外交政策的选择和亚太地区秩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日苏邦交正常化是日本逐步摆脱美国从而实现自主外交的重要尝试。以鸠山一郎为代表的“对美独立派”政治家主导了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日苏两国领土问题的无果而终使得日苏邦交的成果大打折扣，这让日本国内舆论对所谓的“自主外交”丧失信心，从而强化了后来被称为“对美从属外交”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鸠山对苏外交的“挫折”让此后日本的历届当政者认识到违背美国意向开展自主外交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因此在对外政策制定中都特别注意尽量避

1 [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起源》，李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169页。

2 [美]入江昭：《权力与文化》，第150—153页。

3 细谷千博「日露・日ソ関係の史的展開」、『国際政治』第31号、1966年、14頁。

4 相关研究参见田中孝彦「日ソ国交回復の史的研究」有斐閣、1993年。

免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行动。¹

其次,领土问题的悬而未决导致日本在对外政策选择中不得不考虑苏联的反应。日本虽然选择了站在美国这一边,但在一些实际的政治议题中却又不愿过度刺激苏联。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顺理成章地在既定日程中,但是,两国直到1978年才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两国在“反霸条款”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针对中国提议将“反霸条款”写进和平友好条约的主张,日本认为中国的“反霸”是针对苏联的,会激怒苏联。²

最后,领土争端问题成为日苏/俄关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日本政府对两国领土争端的基本立场是,“北方四岛”不属于1951年“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所应该放弃的领土,而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则认为南千岛群岛属于“旧金山和约”中所述千岛群岛的一部分。领土争端同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共同导致了两国互不妥协的政治立场。对于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背信”行为、苏军对中国东北日本侨民的“蛮横”行为、在西伯利亚虐待日本战俘的“残忍”行为等,都让其在领土争端的立场上不容有妥协的余地。对于苏联而言,收复故土本就是对日作战胜利者应有的姿态,同时也是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重要标志,因此苏联也难以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³

结合两国所面临的国际情势来看,南千岛群岛问题对于日本是领土问题,对于苏联则更多地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在过去,特别是冷战时代,日本将苏联视为“威胁”,但日本追求收回“北方四岛”的执念并非基于消除苏联“威胁”,而是追求其“固有领土”的“完整性”。⁴苏联则把美日同盟,特别是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视为对苏联的威胁。日苏之间围绕领土的谈判,苏方诟病日本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给苏联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

三、冷战的终结与日本对俄认知的变化

(一) 威胁认知变化的政治动力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1 泉川泰博「日ソ国交回復交渉をめぐる日本の自主外交模索とアメリカの対日戦略」、『国際政治』第144号、2006年、141頁。

2 史桂芳:《“以民促官”与“求同存异”——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与基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163页。

3 河原地英武「日ソ関係の過去十余年」、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仲夫など編『日ソ関係史: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595頁;横手慎二:《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吉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页。

4 邵景楷:《日本“固有领土论”的话语建构——从“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争端谈起》,《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第97—133页。

日苏关系变成日俄关系，但是其实质性的内容（领土争端以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没有任何改变。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分为15国，俄罗斯虽然是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因为冷战期间同美国的军事竞争和内耗而元气大伤。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在对外政策上迫切希望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以及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

日本政府对此行动比较积极，将苏联解体视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重要机遇。虽然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的核武器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但今日俄罗斯的整体实力与苏联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苏联解体也开始重塑亚太地区的区域秩序，其中冲击最大的就是日美同盟。日美关系因20世纪80年代两国的经贸摩擦而受到影响，进入90年代后因冷战时期最大的共同“威胁”消失，“同盟漂流”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国内讨论较多的议题。¹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案例或许可以表明冷战后日本对俄威胁认知的变化。

日本自卫队综合幕僚监部所发表的数据资料显示，自有统计数据以来，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其领空直接“侵犯”的次数共计42次（截至2020年4月）。²其中，苏联/俄罗斯“侵犯”日本领空的次数达到39次。在日本看来，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并没有停止在军事上威慑日本的行动，俄军机的活动范围已经超过了北海道等传统活动范围，在日韩争议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以及冲绳附近海域都有俄罗斯军机活动的痕迹。但是，防卫省2019年《防卫白皮书》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日本自卫队军机针对俄罗斯军机的起飞次数相对下降。

虽然俄罗斯“侵犯”日本领空的次数按照日方统计居首位，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刻意突出俄罗斯对其领空的“侵犯”。根据防卫省的定义，自卫队军机紧急起飞的条件主要在于判断对方军机是否有可能“侵犯”领空，³这给日本自卫队更大的酌情或者推测性预判的空间。此外，根据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的推测，来自俄罗斯的军机主要为不具有攻击性的侦察机，这也为日本政府弱化俄罗斯威胁认知提供了口实。⁴

在日本看来，俄罗斯虽“实际领有”“北方四岛”，却在威胁认知上不及中国给日本带来的“威胁”大。日本在判断威胁的时候考虑到了动态平衡的因素。日本认为俄罗斯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如果不是相对静止的话）。由于苏联在冷

在日本看来，俄罗斯“实际领有”“北方四岛”，却在威胁认知上不及中国给日本带来的“威胁”大。

1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岩波書店、1997年。

2 統合幕僚監部「令和元年度の緊急発進実施状況について」『総合幕僚監部報道発表資料』（令和2年4月9日）、6頁、https://www.mod.go.jp/js/Press/press2020/press_pdf/p20200409_01.pdf，2020年5月20日访问。

3 防衛省『防衛白書：日本の防衛』（令和元年版）、273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9/pdf/R01030102.pdf>，2020年5月20日访问。

4 統合幕僚監部「令和元年度の緊急発進実施状況について」（令和2年4月9日）、https://www.mod.go.jp/js/Press/press2020/press_pdf/p20200409_01.pdf，2020年5月20日访问。

战期间常态化地“侵犯”日本领空，所以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人的类似行为并没有强化日本的威胁认知。日本这种有意弱化俄罗斯威胁认知的背后，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日本通过主观上示好俄罗斯来寻求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在冷战期间，受制于美苏两极格局的影响，日本在对苏政策特别是解决领土争端的问题上并无太多自主操作的空间。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积极尝试通过首脑外交等途径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其次，从日本国家战略的视角来看，将俄罗斯作为日本潜在的战略伙伴制衡中国，也是在日本被讨论较多的选项。

(二) 日本舆论对俄认知的嬗变

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显示，自1978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日本民众对苏联/俄罗斯的亲近感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准，但冷战后相较于冷战期间日对俄亲近感略有增加。¹ 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相较于苏联时代，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给日本带来的“威胁”有所减少（至少在日本民众看来如此）。第二，苏联解体为日本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可行性，或者说这种愿望增加了日本对俄罗斯的亲近感。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亲近感总体仍然较低，但也出现了三次小范围的提升，这三次亲近感的提升恰好出现在日本解决领土争端的三个窗口期。其中，1991—1992年日本对俄罗斯的亲近感增强，这时苏联刚刚解体，日本对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充满期待，并伺机解决领土争端事宜。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日本时任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安倍晋三的父亲）便开始着手日苏和平条约谈判问题。² 安倍晋太郎认为富有改革精神的戈尔巴乔夫是推动日苏和约缔结并解决领土争端的不二人选，并且直接推动了戈尔巴乔夫1991年对日本的正式访问。但是，安倍晋太郎在戈尔巴乔夫访日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戈尔巴乔夫也在同年8月发生的政变后失势。日本政府于是将解决领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身上，并趁着苏联解体、体制转型的热度促成了叶利钦1993年访日。在叶利钦访问日本时，日俄签署了《东京宣言》，《东京宣言》首次明确了伊图鲁普、库纳施尔、赫巴马伊、施科坦四岛存在领土争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中并未提及的伊图鲁普和库纳施尔两岛的归属问题也在《东京宣言》中得到了确认，这让日本舆论看到了解决领土问题的曙光。

第二次亲近感的提升发生在21世纪初期。普京接替叶利钦就任总统是日本

1 历年的数据可参见日本内阁府网站，内阁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各年度)、<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2021年11月29日访问。

2 麻田雅文「なぜ安倍首相にとってロシアはこんなに『特別な存在』なのか」、<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56100?page=2>，2020年5月30日访问。

人对俄罗斯亲近感提升的重要契机。日本对于普京的执政,更是表现出一种赞许的态度。这种赞许的背后意图比较明确——想趁着俄罗斯在社会体制转型、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之际,利用其迫切希望得到日本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心理,顺利解决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领土归属问题。¹但是,随着此后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升,俄罗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利用经济援助来获得俄罗斯妥协的策略并未奏效。此外,1993年签署的《东京宣言》是苏联解体不久俄罗斯实力最弱的时候缔结的,俄罗斯舆论此时认为,该宣言在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上让步太多,因此普京政府不愿回到该宣言的立场上同日本磋商领土争端问题。²

第三次亲近感的提升发生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之后。如前所述,安倍晋三的父亲晋太郎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安倍晋三秉承其父遗志,也想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有所突破。³安倍自上台以后,积极利用双边以及多边外交场合,通过搭建与普京本人的首脑外交来推动领土磋商。另外,日本还辅之以经济合作与援助等手段,配合俄罗斯政府的远东开发政策。

与日本舆论将领土问题作为重要关切相比,俄罗斯民众并不把领土争端视为日俄交流的主要障碍。1993年的舆论调查显示,80%以上的俄罗斯受访者希望将南千岛群岛问题同经济文化交流分开来处理,对此,只有约40%的日本受访者持上述主张。⁴多数俄罗斯民众将南千岛群岛问题与对日认知分开,而大多数日本民众则将领土问题与对俄认知相挂钩,这导致俄日两国民众在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上呈现鲜明的反差。俄罗斯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较高,冷战结束伊始一度达到78%,虽后来逐渐降至50%左右,但日本在俄罗斯仍然属于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⁵日本对俄罗斯的亲近感一直徘徊在10%—20%之间。究其原因,这种反差跟领土问题在各自国民心中的定位不同有关。

四、安倍政权对俄战略的逻辑

(一) 安倍谋求改善日俄关系的战略动机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不同于以往的短命内阁,安倍破纪录的长期执政给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带来可能。作为希望挣脱战后体制束

1 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第330页。

2 伏田寛範「日ロ平和友好条約の経緯と今後の展望」、平成30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ポスト・プーチンのロシアの展望』(報告書)、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87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R01_Russia/JIA_russia_research_report_2020.pdf、2021年11月29日访问。

3 谷内正太郎「同じ船に乗らねば領土交渉にならぬ」、「外交」Vol.19、2013年、90頁。

4 内閣知枝子「日ロ共同調査『北方領土問題等に関する日ロ両国民の意識』」、「日本世論調査会報」第72巻、1993年、25頁。

5 セルゲイ・V. チュグロフ「形成途上の外交政策」、猪口孝監修「日本とロシア:真逆か、相違か?」、170頁。

缚的领导人，对内修改宪法、对外同俄罗斯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挣脱战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安倍在上台后不久就积极开展对俄外交，不同于既往对俄政策的思路，安倍更加推崇首脑外交，期待通过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来深化两国关系。

截至2019年9月，安倍自上台以来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27次，如果不受2019年原定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取消以及2020年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安倍同普京的会见次数势必还会有所增加。如果单纯从数量来看，日俄领导人会谈的频度已经超过同期日美领导人的会谈频度。对于安倍而言，其对俄外交中领土问题占据重要的地位，但绝对不是唯一关切的事项。在日本的战略视野下，俄罗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安倍上台以来日俄关系逐渐升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安倍也通过多个层面立体地推进日俄关系向前发展。

第一，继续深化日俄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在安倍上台之前，日俄之间已经存在副部长级缔结和平条约问题联合委员会、日俄战略对话会议等定期磋商机制。安倍上台之后，于2013年同俄罗斯建立外交、防卫（国防）部长（即“2+2”）会谈机制。日俄“2+2”会谈机制是日本继日美（1990年）、日澳（1990年）之后建立的第三个高级别磋商机制。日本则是继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第五个与俄罗斯建立该机制的国家。截至2019年年底，两国已经召开四次“2+2”会谈，并就领土、东北亚局势展开富有成效的交涉。¹

第二，淡化俄罗斯的“威胁”，争取俄成为日本的战略伙伴。2013年日本出台了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对俄罗斯不乏善意的解读和定位。该报告指出，在当前东亚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日本推进同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以及能源领域的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²此外，日本政府2019年4月发布的《外交蓝皮书》指出，日俄关系是最具潜力或者最具可能性的双边关系。一直以来，俄罗斯在日本《外交蓝皮书》中的角色越来越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它很少出现在“威胁国家”的序列里。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第一次把“北方四岛属于日本”的表述删掉了，虽然其背后的逻辑尚不明确，但对俄释放善意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强化同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不久（2013年4月）就对俄进行正式访问，其间日本同俄罗斯签署了15份经济贸易协议。受到国际石油天然气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克里米亚危机后遭到西方国家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同日本之间的贸易额不降反升。2016年，安倍两度访俄并提出将在城市开发、能源开发、远东振兴等8个领域向俄罗斯提供约3000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合作方

1 相关数据和内容可参见安成日编：《日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年表》，北京：时事出版社，2020年版，第285—300页。

2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平成25年12月17日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閣議決定）、22頁、<https://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2020年5月26日访问。

案。俄罗斯也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来提振本国的经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报告显示,2016年之后日本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18年突破200亿美元大关。¹

安倍重视改善同俄罗斯关系的背后固然有解决领土问题的迫切愿望,同时还有利用俄罗斯来牵制中国的政治意图。²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之一,日本的对俄战略也充分考虑到中国崛起这个变量。2019年1月,安倍的外交特别辅佐官河井克行表示,日本强化同俄罗斯的合作,“有联合俄罗斯共同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的用意”。³中国需要警惕日本的图谋。目前来看,日本希望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圈”的意图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从战略诉求的角度来看,中俄两国更具有一致性,且日美同盟本身就有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意图。

(二) 领土问题的解决停滞不前

尽管安倍政权通过首脑外交、经济外交、战略联合等多种方式向俄罗斯示好,但两国关系在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上仍旧停滞不前。日本政府主张四岛一并归还的原则未有实质性的松动,俄罗斯则强调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逐渐解决领土问题。两国在该问题的原则立场基本处于平行线上。如前文所述,2012年安倍上台是解决日俄领土争端的重要机遇,他本人也多次表示力求在其任内解决该问题,但事情操作起来远比想象中复杂。

2013年12月4日,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汎作为证人受邀出席众议院冲绳及“北方领土”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木村提出,国际形势和俄罗斯国内的形势都在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生变化,解决领土争端的最佳时期应该从2017—2018年开始。如果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那么今后恐怕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者谈判手法过于拙劣的话,恐怕就只能收回两个岛屿。⁴如今,木村所谓的2017—2018年机会窗口期早已经过去,而“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却没有进展。

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編『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3—2019各年版、ロシア編)、JETRO、<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 2020年5月20日访问。

2 阎德学、孙超:《日俄接近新常态评估》,第80—81页;小泉悠「軍事面から見た日露平和条約交渉:『軍事の論理』と『政治の論理』の狭間で」平成30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ポスト・プーチンのロシアの展望』(報告書)、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82—83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R01_Russia/JIIA_russia_research_report_2020.pdf, 2021年11月29日访问。

3 「日露平和条約交渉、中国の脅威念頭 自民総裁外交特別補佐・河井克行氏」、『産経新聞』2019年1月9日。

4 「第185回国会衆議院冲縄及び北方領土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議録」(第3号)、平成25年12月4日、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a.nsf/html/kaigirokua/002518520131204003.htm, 2021年11月29日访问。

日俄领土问题的悬而未决既与日俄两国的国内政治有关，也与日俄关系的战略定位有关。日本国内包括政府高官在“北方领土”谈判问题上的主张较为多元，其中既有重视现实利益的温和派，也有重视原则的强硬派，这让政府在该问题上难以取舍。¹特别是考虑到国内强大的“领土民族主义”，“固有领土”的紧箍咒导致任何一位日本领导人都不要轻易作出任何让步。日本政府在2016年以后开始了对俄领土外交的新思维，但是，通过经济合作开发换取领土让步的政策没有产生积极效果。

在俄罗斯这边，曾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Mikhail Titarenko）院士指出，“在日本对领土问题顽固不让步的条件下，俄罗斯应该明确地让东京明白，我们的立场是确定的，我们没打算退让，这是俄联邦在太平洋的安全保障问题（一旦亮起红灯，我们就无法再往前走）”。²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乃是其固有领土的认知远超出日本政府的想象。同时，领土问题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返还那么简单，其背后还有潜在的军事博弈。

在冷战时代，日本将苏联视为“威胁”，而苏联则把美日同盟，特别是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视为对苏联的威胁。无论是在日苏之间还是在日俄之间围绕领土的谈判中，俄方诟病日本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其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津（Mikhail Galuzin）2019年3月28日表示，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对俄罗斯的安全保障而言仍然是重大的威胁。俄罗斯希望获得的承诺是，在俄日缔结和约之后，美国撤出在日本的军事基地。³日本政府包括安倍本人已经多次承诺，假如“北方领土”回归日本，美国不会在该地部署军事基地。随着秋田县以及山口县被日本政府作为陆上宙盾反

无论日本的主观
意愿如何，美日军事
同盟在事实上是阻碍
日俄接近的重要制约
因素。

导系统的候补地区之后，俄罗斯已经多次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1991年苏联解体后，前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相继加入北约，美国也在这些国家设置了军事基地，导致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受挤压。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遭受到的这些背叛行为也促使其在思考领土争端问题时不得不考虑俄美关系。⁴因

1 2013年5月日本外务省发行的杂志《外交》中曾推出专辑研讨日本应该如何同俄罗斯谈判“北方领土”问题，森喜朗前首相、谷内正太郎（后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内阁官方参与，被认为是“温和派”，而日本驻俄罗斯大使丹波实、俄欧亚21研究所理事长吹浦忠正则被视为“强硬派”。转引自河内明子「日露間の領土交渉」『レファレンス』第64卷、第3号、2014年、101—121頁。中文学界对该分类的研究可参见陈梦莉、张强：《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原因及影响》，《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5期，第137—155页。

2 [俄]米·列·季塔连科：《俄罗斯的亚洲战略》，李延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3 「在日米軍、ロシアの脅威＝駐日大使が会見」、<https://www.nippon.com/ja/news/yjj2019032900026/>，2020年5月27日访问。

4 小泉悠「軍事面から見た日露平和条約交渉：『軍事の論理』と『政治の論理』の狭間で」、82頁。

此,无论日本的主观意愿如何,美日军事同盟在事实上是阻碍日俄接近的重要制约因素。

基于上述考虑,俄罗斯开始越发重视日俄争议岛屿的安全防卫。梅德韦杰夫在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政府总理期间先后4次访问南千岛群岛。2017年2月,梅德韦杰夫下令给南千岛群岛中的5个无名岛命名。其中,以二战结束时代表苏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杰列维扬科将军(Kuzma Derevyanko)的姓名给俄日争议岛屿中的一座岛命名,这座岛属于南千岛群岛中的赫巴马伊群岛。另外,俄方把南千岛群岛中施科坦岛附近一座岛屿以二战末期与日作战的一名苏联将军的名字命名。¹这似乎是在向日本宣示,俄罗斯所领有的南千岛群岛是通过战争收回的故土。2016年11月,俄罗斯宣布在南千岛群岛的两处军事基地部署导弹系统,并表示导弹系统“是在国防建设框架内进行部署,这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²

对于俄罗斯而言,另一个现实性的障碍在于,俄罗斯对内对外都释放着强大的领土主权意识。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致使其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唯一一个领土面积增加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氛围很难让普京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此外,由于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在涉及领土问题上与外国之间的协议不仅要得到联邦议会的批准,也要得到联邦构成主体的承认。³管辖南千岛群岛的萨哈林州明确表示反对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例如2013年时任萨哈林州长的霍洛沙文(Aleksandr Khoroshavin)在访问日本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现在的南千岛群岛上,“俄罗斯居民中没有一个人赞成将岛屿归还日本”。⁴

五、结语

在当前领土民族主义泛滥的大背景下,领土争端很难得到妥善的解决,任何在领土问题上的让步都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的极大损害。从客观上来讲,俄罗斯在开发远东地区的过程中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但是,日俄两国的经济联系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不匹配。在当前经济合作不温不火的态势下,经济合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两国在领土问题上形成共识值得怀疑。

近些年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在战略上开始强化同俄罗斯的关系。但是,日本企图以日俄接近来牵制中国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在

1 《俄罗斯命名5个争议岛屿》,《解放日报》,2017年2月15日。

2 《日媒: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部署导弹是牵制中国》,中华网, <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61127/30053697.html>, 2020年5月27日访问。

3 阎德学:《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第335页。

4 《俄萨哈林州长:俄无人赞成南千岛群岛归还日本》,环球网,2013年4月23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Addw>, 2020年5月19日登录。

于，日本在高估了中国崛起给俄罗斯带来压力的同时，还低估了日美军事同盟给俄罗斯带来的压力。日本战略上重视俄罗斯固然是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日俄关系更容易受到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制约，而非仅仅局限在地区双边关系的层面。¹当然，日本的对俄战略转型尚处于过程之中，东北亚乃至国际格局的变化所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需要跟踪研究。中国作为日俄两国重要的邻国，自身已经成为日俄关系的重要变量，应该在正确认知自身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关注日俄关系的走向。

¹ 阎德学、孙超：《日俄接近新常态评估》，第85页。